

中西比较文学的新转向：从趋同到求异

A New Orientation in Chinese-Wester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From Homogeneity to Variation

王 宁 (Wang Ning) 刘桐阳 (Liu Tongyang)

内容摘要：变异学是中国比较学学者曹顺庆提出的具有原创性的观点之一。这表明，比较文学研究，尤其是中西比较文学研究已不再仅仅是为了追求趋同性，它也要对不同民族/国别文学之间的差异进行研究。在这方面，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再加之语言之间的隔膜更是显示出差异大于相同，因此对之的比较研究就要寻求其异质性。当然我们无法否认不同民族/国别文学之间仍存在着一定的趋同性，但在这个意义上，尤其是之于中国和西方的文学，趋同性只是相对的，而异质性才是绝对的。由此变异学理论的提出将为当前被视为处于危机之中的国际比较文学研究指明一个新的可能的发展方向。这也是曹顺庆对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作出的中国学者的贡献。

关键词：变异学；曹顺庆；中西比较诗学；世界文学；中国学派

作者简介：王宁，上海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主要研究领域为中西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刘桐阳，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Title: A New Orientation in Chinese-Wester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From Homogeneity to Variation

Abstract: Variation theory is one of the original viewpoints put forward by China's comparatist Cao Shunqing. This shows tha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especially the study of Chinese-Wester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s no longer just a pursuit of convergence, but also an exploration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national literatures. In this respect, Chinese literature and Western literature belong to two completely different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the gap between languages is more than similarities, so the comparative study should seek its heterogeneity. Of course, we cannot deny that there is still a certain degree of convergence between different national literatures, but in this sense, especially for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ture, the convergence is only relative, heterogeneity is absolute. The emergence of the theory of variation would point to a possible new direction for international com-

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which is currently considered in crisis. This is also Cao Shunqing's contribution, as a Chinese comparatist, to the cross-cultur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Keywords: Variation Theory; Cao Shunqing; Chinese-Western comparative poetics; world literature; Chinese school

Authors: **Wang Ning** is Distinguished University Professor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and foreign member of Academia Europaea. His academic research focuses on Chinese-Wester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 (Email: wangn22@sjtu.edu.cn). **Liu Tongyang** is a Ph.D student of comparative and world literature at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Email: liutongyang@sjtu.edu.cn).

虽然比较文学在中国曾一度十分兴盛，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占据了文学和文化研究的一些其他学科领域，但是国际学界对中国比较文学的兴盛状况却知之甚少。从这个意义上说来，要用国际通用的语言发表中国学者的著述或表明中国学者的观点，英语是绝对必要和重要的传播媒介。曹顺庆这位兼通中西学术的人文学者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近年来除了在国内不遗余力地推介他自创的具有原创意义的比较文学“变异学”，并且花了很大力气将他原先用中文撰写的一些著述和论文改写并请人翻译成英文，交由国际知名的出版社或期刊发表。在这篇文章中，我将继续对曹顺庆的《比较文学变异学》一书早先进行的讨论¹，重点介绍他为新世纪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提出的新方法：从他的《比较文学变异学》入手，兼及他的另一些中文著作。

从比较诗学到变异学

在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界，曹顺庆至少在三个方面享有较高的知名度：首先，他于1987年率先在四川大学获得中文和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后改写成专著《中西比较诗学》于1988年出版。作为一本具有拓荒性质的早期著作，这本专著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没有全然过时。毋庸讳言，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学者们能保持“各领风骚三五年”就很不容易了，更遑论三十年了。其次，他率先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中国的文学批评界提出了“失语症”现象，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文学批评话语是否缺失的讨论，实际上，按照他本人的说法，他提出的“失语症”“其实就是一种阐释的变异”（曹顺庆，“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中的变异问题”26）。不管人们是否同意他的这一观点，

1 参见 Wang Ning, "Variation Theory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 Book Review Article about Cao's Works," *CLCWeb: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6 (2013): 18.

都不能不提及他当时发表的这一颇有争议的论点。这样的讨论直至今日仍有着一定的反响，对我们构建中国自主人文学术理论话语有着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作用。再者，他也是首位将文学变异现象加以理论化的中国学者，尽管也许在他之前已经有人在实践中采用过这样的方法。

由此可见，曹顺庆在中国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方面一直走在前列。无论他写什么、谈论比较文学也好，谈论文学理论也好，多少都会引起一些讨论、甚至争论，或至少会引起国内批评界的关注。这是当今中国绝大多数比较文学学者所无法望其项背的。自从他的专著《比较文学变异学》（*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2014）出版以来，变异理论一直在中国的比较文学界持续地被人们谈论或争论。尽管它已经在国内引起了讨论，但这一次所引起的关注，可能是在国际范围内的。这本书是他基于长期的思考和研究的一部集大成之作，尽管其中的一些章节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在国内发表过¹。可以说迄今为止，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很少能在英语世界出版自己的专著，因此就此而言，这本书的出版是非常及时的，其意义已经随着相关学术争论的日渐深入而逐步显现出来，并将在未来几年里继续显现出来。它至少可以让国际比较文学界了解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在思考什么问题，进行什么样的理论研究和探索。

也许学者们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说他的这本书将有助于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的转向呢？在简要回顾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现状之后，我们将对此作出解释。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西方同行是如何看待这本书的。正如曹顺庆所指出的那样，他受到了已故荷兰比较文学学者佛克马（Douwe Fokkema）的建议，佛克马是一位有着很深中国文学造诣的比较文学学者和文学理论家，在他有生之年曾多次访问过四川大学，并鼓励曹顺庆用英语重写他曾经用中文发表过的文章，以便他的思想也能被国际学术界关注。当他得知曹顺庆要将他的变异学著作改写并译成英文在国外出版时，佛克马欣然应允为该书作序。事实上，正如佛克马在序中所指出的那样，曹顺庆的这本书的意义应该得到承认，“曹的书旨在与欧洲、南北美洲、印度、俄罗斯、南非和阿拉伯世界的学者展开对话。（当今世界已经是一个多极体系，其时间比我们大多数人意识到的都要长）”（Cao v）²。因为尽管有不少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在构建各种理论框架时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观点，但他们的观点却不能被那些不懂中文的人读懂。也就是说，与他的大多数同事相比，曹顺庆不仅涉及国内学术，以中国的文学现象来佐证自己的理论建构，而且还广泛涉猎国际比较文学界的一些为人们所共同关心的话题，并试图从中国的立场和观点介入讨论与之进行平等对话。如果我们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和更为广大的人文学者只能与我们自己的同行对话，而不能解决一些普遍的国际问题，

1 参见曹顺庆：“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中的变异问题”，《中山大学学报》3（2014）：24-29。

2 本文外文引文均出自笔者译。

那么我们将不仅失去我们的理论话语，而且更无法与我们的国际同行进行平等的对话。因此，在佛克马看来，“不接受曹顺庆旁征博引论述所提出的挑战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他的“论点包含了许多相关的观点，即使我们有理由不赞同他的看法，我们也必须表达我们自己的观点，以便继续展开讨论”（Cao v）。也就是说，曹顺庆这本书的出版将在国际比较文学同行中引发理论讨论和辩论，尽管西方的同行对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研究知之甚少，但很可能对它们发生兴趣。我想一部学术著作若能达到这一点至少就已经成功了一半。

据我们所知，曹顺庆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并没有指望西方同行会赞同他的观点，或者将他的一些理论学说应用到实际的研究中，他写这本书的真正意图，只是想吸引西方和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当代比较文学研究的批评性和学术性关注，试图表明中国学者在做一些与他们不同的事情，以便在东西方比较文学学者之间展开平等的对话。也即按照他在一篇同年发表的中文文章中所指出的，“在比较文学研究中，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变异现象。这是我们提出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中的变异问题”24）。我想，如果这个目标能够在今后的岁月里实现的话，他作为作者也就应该感到欣慰了。实践证明，他的这一初衷可以说已经达到了。因为这至少表明，中国学者将不再遵循西方同行的教导，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我们完全有能力从中国的立场观点出发，与西方学者讨论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从而以平等的方式发出我们独特的和不同的声音，并与他们进行对话。或者更具体地说，在过去，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总是试图寻求中西文学的同质性，但现在，我们越来越发现，中西文学之间的差异大大胜过相同，因而将试图寻求其间的异质性并予以分析。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的出版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学界，都标志着当代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一大突破。

在详细讨论这本书之前，我们认为有必要再次对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进行一次鸟瞰式的回顾，尽管我们在其他地方也作过这样的回顾。根据佛克马的说法，中国的比较文学始于鲁迅的《摩罗诗力说》的发表。因此，鲁迅应被视为中国第一位比较文学学者。但是包括曹顺庆在内的其他人则有着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王国维创造性地运用叔本华的哲学和美学理论解读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因而他也应被视为中国近代最早的比较文学学者之一。我们自然也有同感。¹但是，他们当时都没有清楚地意识到比较文学是一门学科，因为比较文学研究最初被引入中国时，只是被视为一种方法论，而不是一门学科。尽管如此，1930年代中国的一些著名大学已经开设了比较文学课程，因为有不少中国文学学者在西方著名大学取得学位后，开始在中国教书，例如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范存忠回国后先在东南大学开设中英

1 参见王宁：“比较文学在中国：历史的回顾及当代的发展方向”，《上海交通大学学报》6（2018）：110-117+2。

文学关系课程，后来又任教更名后的中央大学；在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学位的吴宓在清华大学教授英国文学，并将其与中国古典文学进行比较；在斯特拉斯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朱光潜则同时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开设西方美学和文艺心理学课程。他们的开创性工作无疑为后来中国比较文学的全面复兴铺平了道路。抗战期间，一些西方学者，如I.A.理查兹和威廉·燕卜孙，也应邀到中国的一些著名大学讲学或授课，如战时的西南联合大学，培养了一批兼通中西文学的学者。再加上西方比较文学学者出版的一些基础性著作的大规模翻译成中文，比如保罗·凡·第根的《文学比较》一书，比较文学已经开始被列入大学课程，这无疑预示着在20世纪80年代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的全面复兴。当然，那个拓荒的时期应被看作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史前期，但对于那些外国学者来说，了解为什么比较文学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得以在中国发展得如此迅速也很重要。

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文学得以恢复，这主要归功于老一辈学者钱锺书、季羡林、杨周翰和乐黛云等人的努力。曹顺庆和本文作者之一王宁一样，很幸运地有机会成为最早的一批比较文学博士研究生：他专攻中国古典文学理论和比较诗学，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获得博士学位；王宁则专攻英文和比较文学，在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获得博士学位。但即使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学者还没有意识到比较文学的重要性的时候，曹顺庆就率先采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古典文论，并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出版了第一部关于中西比较诗学的专著。当时大多数中国古典文学学者并不重视刚刚在中国兴起的比较文学学科，认为这样的比较存在着一定的风险。更有人一知半解地认为，所谓比较文学不过就是拿中国文学与外国的文学比较罢了，并无甚新意。应当指出，曹顺庆的第一部著作《中西比较诗学》与其他中文著作一样，是进行中西诗学对话的早期尝试，他向广大读者昭示，比较文学不仅运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不同民族/国别的文学，同时也运用阐发的方法平行比较不同民族/国别的文学理论（诗学）。很明显，他的灵感最初来自于他的西方先驱，如刘若愚和孟而康。¹ 当时，像他的许多中国同事一样，他非常谦虚地向前辈学者学习，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因为比较文学对于许多中国文学学者来说都是全新的。虽然他后来的研究早已超越了他在那本早期著作中所做的工作，但其开创性意义却不容忽视。正是从这本书中，我们已经发现曹顺庆大胆地从比较的角度探索中国古典文论研究的新方向：借鉴西方的批评观念重新审视中国古典文论的美学范畴，并试图从中国的角度重构这些西方批评观念。显然，即使在他早期的著作中，他仍然不仅在中西文论中寻找相似之处，而且也试图在这两者之间发现不同之处，这无疑也预示了他后来对变异现象研究的投入。

1 参见 Wang Ning, "Earl Miner: Comparative Poetic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World Poetics," *Neohelicon* 2 (2014): 415-426.

如果说前面提到的早期著作是曹顺庆开始系统地研究比较诗学的初步尝试的话,那么他的理论探索在那部最为雄心勃勃的多卷本《中外文论史》中达到了高峰,这本书应该被看作是一部中文语境中补缺性的著作,作为对由国际比较文学协会主持的更为庞大的和多卷本《用欧洲语言撰写的比较文学史》(*The Comparative History of Literature in European Languages*)的补缺。这部四卷本的文论史由十多位学者撰写,涵盖了广泛的地理分布,涉及中国、希腊、印度、古罗马、埃及、波斯、英国、法国、德国、韩国、美国等国家的文学理论,不仅跨越了语言和文化的边界,也跨越了文明的边界。这部巨著的力量,虽然只是一部史学著作,但主要在于它首次将中国文学理论置于世界文学理论的大背景下,突出了中国文学理论的不同特点和独特地位。这也说明,要写出一部全面的世界文论史或世界诗学史,就不能忽视非西方国家的文论和批评,尤其对中国文学而言更是如此。因为中国有自己独立的文论体系,以刘勰的《文心雕龙》为里程碑。但令人遗憾的事,这样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论著作却长期不受重视,甚至在孟而康的题为《比较诗学》的著作中也简略地提及。¹毫不奇怪,曹顺庆主编的这部《文论史》对《文心雕龙》的讨论占据了180页左右的篇幅,因为这也是曹顺庆本人的专长,而一些同样重要的西方理论著作却没有占据类似的篇幅。由于它是一部多人合著的著作,而且只有中文版本,因此它并没有在中文语境之外产生任何影响。

可以想象,曹顺庆作为一位有着自觉理论创新意识的比较文学学者,并不满足于仅仅对一些文学批评文本进行平行比较分析,或者总结其他人在历史上已经做过的事情。应该说,比较文学的变异学就是他长期的理论思考和实证研究之积累的结果。这里我们想强调的是:他在对中西文论进行比较研究之后,从变异现象得到启迪,试图在这方面做出自己的理论建构。正如他在书中提到的,其他一些中国学者,如谢天振和严绍璦,也已经将中国文学与其他民族文学之间的差异进行了比较,以便找到一些不同而并非相似的东西。但是曹顺庆却是第一个尝试将这些现象加以概念化并进行理论建构的中国学者。在我们看来,变异学的力量和价值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变异学是对以前的‘法国学派’片面强调影响研究的回应,也是对美国学派在新批评的启发下注重审美解读但却遗憾地忽视了非欧洲语言文学的回应”(Cao v),并据此为当前的国际比较文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不同文学的跨文化和跨文明比较研究。尤其是之于来自不同文化传统和文明的中国和西方的文学,这显然是差异大于相同。这正是变异学得以提出的一个出发点。

其次,正如佛克马所中肯指出的,事实上,也有“优秀的跨文化研究,

1 参见 Wang Ning, "Earl Miner: Comparative Poetic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World Poetics," *Neohelicon* 2 (2014): 415-426.

如美国的日本学研究者孟而康，或在美国教书的华人学者刘若愚，日本人吉川小次郎的宋诗，或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的唐诗研究。他们都讨论了同质与异质现象和同异现象，并对曹顺庆提供的理论框架中的变异有着敏锐的洞察力”（Cao vi）。但是曹顺庆首先总结了中西文学中出现的各种变异现象并做出自己的分析。他认为，这种差异有五个方面：（1）文学现象在不同民族之间的变异；（2）文学现象在不同语言之间的变异；（3）文学文本层面的变异；（4）文化层面的变异；（5）文明层面的变异。¹人们可能会发现这种变异的更多方面，但这五个方面几乎足以说明，跨越语言和文化边界的比较文学研究不仅要追求同质性，而且要探求异质性。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全球文化正朝着越来越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异质性越来越具有诱惑力。因此，作为比较文学学者，我们不仅要在相似的文化传统或文明背景下比较研究不同的文学作品，更要关注比较不同文化传统和文明背景下的文学作品。这样一来，曹顺庆实际上对目前的国际比较文学研究提出了挑战。我们也许不一定赞同他的观点，但是我们却不应该忽视他做出的努力和提出的挑战之意义。

第三，在挑战影响研究和类比研究，或更确切地说，平行研究的缺陷时，曹顺庆大胆地提出变异研究，这可能对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比较文学研究有所贡献。对他来说，“文学变异学为比较文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新的方法和新的理论，也是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Cao 93）。至于这种方法是否能在国际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取得真正的突破，我们将拭目以待，但是他的这种勇气和探索精神应该为我们非西方的比较文学学者在跨文化、跨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中所效法。

当然，作为一部理论著作，《变异学》并没有停留在提出一个理论概念的阶段，而是阐述了如何进行变异研究，以及这种方法论所涵盖的内容。曹顺庆认为：“关涉类比研究的变异主要包含五个范畴：影响研究中的变异，类比研究中的变异，语言翻译中的变异，国外形象中的变异以及文化过滤和误读中的变异”（Cao 87）。不可否认，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的“异化”和“归化”概念在中国语境中也具有重要的影响，并广为研究者引用和讨论，因此有必要对这两个概念进行辨析。但据我们所知，韦努蒂早已超越了他的早期著作中的关切，他的异化翻译策略似乎对挑战和抵抗西方文化霸权更有意义，而不仅仅是形式上的移译。韦努蒂受到最近兴起的关于世界文学讨论的启发，也试图强调翻译在重建世界文学中的作用。²而在曹顺庆书中提及的上述五个范畴中，我们认为第三和第四个范畴将会越来越多地被学者们关注和研究，尤其是在翻译研究和形象学研究方面。

1 参见 Cao Shunqing, *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Heidelberg: Springer, 2014, xxxiii-xxxiv.

2 参见 Venuti, Lawrence, *Translation Changes Everything: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呼之欲出

作为一个热衷于建立中国比较文学学派的中国比较文学学者，曹顺庆从未忘记，他的学术是在对中国古典文论进行深入研究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即使在他构建这种变异学的过程中，他仍然认为，对于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来说，“当前的比较文学研究应该从中国文学理论的逻辑出发，坚持自己的话语规范和价值立场”（Cao 232），因为这是中国学者的强项，他对此有充分的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因此，他认为，“中西文明的比较不是为了找出具体的‘同一性’或差异性，也不是像法国学派那样建立在‘同一性’基础上的可比性，也不是像朱利安那样过分追求异质性，甚至走向‘无关性’”（Cao 236）。他对所谓的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几十年前的实践提出批判固然重要，但他所指出的应该是当下国际学界最前沿的理论课题，如文化研究、生态批评以及世界文学研究，关于这些理论的讨论和辩论现在仍在进行，而且对中国的比较文学理论建构也有着直接的意义，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仍然坚持过时的“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之争。

至于拟议中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曹顺庆始终是抱有乐观的态度，并予以推进，而对于中国学派的特点，曹顺庆并没有像他在中文语境所做的那样详细阐述。但他之所以提出这种变异学作为中国学者的建构以及实践中的突破，是为了用这种新的方法来印证他所鼓吹的中国学派的研究特色。因此，他最后总结道：“变异学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异质文明的文献之间的‘求异’、相互阐释和变异，达到和谐甚至‘和而不同’的效果。人们应该普遍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事实本身就能说明问题，而比较是一种隐含的启示。因此，文明异质性与比较文学变异之间的本质关系是首先承认通约性和差异性，然后建立可比性”（Cao 236）。可以说，这也应该是他提出变异学的一个逻辑起点。

众所周知，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旗号并非是由中国本土学者打出的，而恰恰最早是由中国台湾学者陈鹏翔和在长期在中国港台地区高校工作的美国学者李达三（John Deeney）等人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提出的。但他们并没有在任何国际场合发表类似的见解，也未产生任何国际性的反响。或者我们应该说，与当时的西方同行相比，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还远远不够成熟，并未达到自成一个学派的地步。因此，在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长期主导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的时代，提出这样一个“中国学派”的主张似乎为时过早，并有建构一个“中国中心主义”的企图之嫌。而今天的情况则大不相同了。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确立了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强大政治力量之一的地位。这不可能不使人文学者加强自己的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但由于长期以来东方主义的偏见，中国文化和文学的价值尚未得到国际学界的充分认识。如果我们把高行健看作是一个法国公民的话，那么

他的荣获诺奖并不能算是中国作家的获奖，因而迄今为止，只有莫言作为唯一的一位中国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因此，现在正是确立中国作为文化和文学强国地位的最佳时机，比较文学研究当然可以并且应该作出自己的独特贡献，因为我们始终认为，比较文学是中国诸多人文学科中最开放和最具有国际化特色的学科，它一直活跃在人文学学术研究的前沿，并在中国各人文学科的国际化进程中充当排头兵的角色。在这方面，曹顺庆的著作的出版可以看作是迈出了必要的和及时的一步。

现在我们来阐述一下我们对变异学的理解。尽管曹顺庆在他的书中对变异学做了大量的阐述，我们仍然认为有必要在变异研究中增加更多的课题。第一，翻译与变异。在这里，我们只是简略地指涉一种跨文化翻译，而不是传统的拘泥于语言文字间相互转换的语际翻译。正如劳伦斯·韦努蒂在他十年前出版的一本专题研究文集中所指出的那样，翻译改变了一切。¹事实上，韦努蒂书中讨论的问题还包括翻译的基本概念，如对等、重译和读者接受；社会学主题，如翻译对学术和全球文化经济的影响；以及哲学问题，如译者的无意识和翻译伦理等。但他并没有提到一个重要的变化：即，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不同民族的文化正在经历一种重新定位，翻译本身也发生了变化。人工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将由机器或人工智能来完成，因此无论翻译多么忠实，都总会带来一些不同的东西，或变异，特别是文学或理论的翻译更是如此。即使在一般文档的语际翻译中，也无法达到绝对的忠实，更不用说跨文化翻译了。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发现，通过翻译，原有的边缘文化可以被重新定位，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试图打破单一的中心。²同样，一个原本强势的文化，由于缺乏翻译，可能会被置于边缘地位。这在中国文化的兴起和经济的繁荣中得到了特别的体现。

诚然，与当今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相比，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政治影响力确实无法匹配。在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很少有中国学者在领先的国际学术期刊或著名的国际出版社发表论文或出版专著。仅以人文学科为例，在人文社会科学的主流期刊中，中国学者几乎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也很少与国际同行平等地讨论基本的理论问题。在这方面，翻译自然应该负责，尤其是缺乏高质量的中译外。我们知道，在过去，当中国学者在新文化运动（1915-1923）期间发现中国不仅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而且在文化上甚至在文学上都十分落后时，他们果断地发起了大规模的翻译运动，试图把尽可能多的西方文化理论和文学作品译成中文。当然，这种大规模的翻译确实给中国带来了西方文化的现代性，尽管以一种变形的方

1 参见 Lawrence Venuti, *Translation Changes Everything: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2 参见 Wang Ning, "Translation and the Relocation of Global Cultures: Mainly a Chinese Perspective," *Asia Pacific Translation and Intercultural Studies* 1 (2015): 4-14.

式带入了中国。因此，中国的现代性作为一种不同于西方形态的另类现代性，不仅解构了单一的西方主导的全球现代性，而且丰富了具有中国经验和特色的现代性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变异是不可避免的，有时甚至是十分必要的，在将一种文化翻译到另一种文化的过程中，变异有时会带来新的东西。也即戴姆拉什所说的“在翻译中有所获”（Damrosch 281）。今天，当我们审视中国文学和文化在全球文化和世界文学地图上的位置时，我们便惊讶地发现，由于缺乏翻译，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处于边缘的地位。因此，我们建议把翻译的重点从外语翻译成汉语转移到从汉语翻译成世界主要语言，主要是英语。虽然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和文学思想在翻译的过程中会发生变异，但也同样会带出新的东西，加深外国人对中国的理解。

第二，阐释和变异，尤其是跨文化阐释。我们知道，在将西方理论引入中国的过程中，除了语际翻译，还需要跨文化翻译，或者一种跨文化的阐释，这可能会导致一些不同或变异。但如果它带来了新的东西，那就是十分必要的。这一点在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在英语世界的介绍和批判性接受中也得到了特别的体现。如果没有加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和J·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的巨大努力，解构主义在美国就不会如此受欢迎和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力，而德里达在世界上很可能一直处于边缘的地位，直到他去世。同样，我们也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另一个例子，在将中国文学译成外国语言时，或者更具体地说，如果没有葛浩文对莫言作品的英译，莫言很可能会错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殊荣。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当前实施中国文学和文化走出去的发展战略中，变异现象虽然有可能使中国文学和文化在译介到国外时失去一些东西，但也会产生更多的效果。如果我们能够让中国文学和文化为更广泛的国际观众所了解，这样的失却将是值得的，而且更有必要。

在我们的世界文学研究中，我们曾经试图指出，世界文学应该有两种形式：作为总体的世界文学其形式是单数，而作为具体的世界各民族/国别的文学则是复数。也就是说，我们既有一般的世界文学，又有具体的世界文学。¹如果我们说东西方比较文学研究的传统理论具有寻求类同的特性，那么作为另一种理论学说的变异学就旨在寻求差异，这对于我们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将是更有意义和更具挑战性的。在这方面，曹顺庆堪称一位先行者，他的努力将被未来的研究者写入中国比较文学发展史，同时，也将在国际比较文学的阶段性发展中留下一个印记。

Works Cited

曹顺庆：《中西比较诗学》。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年。

1 参见 Wang Ning, "World Literature and the Dynamic Function of Translation,"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1 (2010): 1-14.

[Cao Shunqing.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Poetics*. Beijing: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1988.]

——: “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中的变异问题”, 《中山大学学报》3 (2014): 24-29。

[—: “The Issue of Variation in Parallel Studie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Journ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3 (2014): 24-29.]

Cao Shunqing. *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Heidelberg: Springer, 2014.

曹顺庆编: 《中外文论史》四卷本。成都: 巴蜀书社, 2012 年。

[Cao Shunqing ed. *A History of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ry Theory*, 4 vols. Chengdu: Bashu Press, 2012.]

Damrosch, David.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P, 2003.

Miner, Earl. *Comparative Poetics: An Intercultural Essay on Theories of Litera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P, 1990.

Venuti, Lawrence. *Translation Changes Everything: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王宁: “比较文学在中国: 历史的回顾及当代的发展方向”,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6 (2018): 110-117+2。

[Wang Ning.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A Historic Review and Its Prospect.” *Journal of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6 (2018): 110-117+2.]

Wang Ning. “Earl Miner: Comparative Poetic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World Poetics.” *Neohelicon* 2 (2014): 415-426.

—: “Translation and the Relocation of Global Cultures: Mainly a Chinese Perspective.” *Asia Pacific Translation and Intercultural Studies* 1 (2015): 4-14.

—: “Variation Theory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 Book Review Article about Cao’s Works.” *CL-Web: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6 (2013): 18.

—: “World Literature and the Dynamic Function of Translation.”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1 (2010): 1-14.